

在文学馆
听讲座

ZAIW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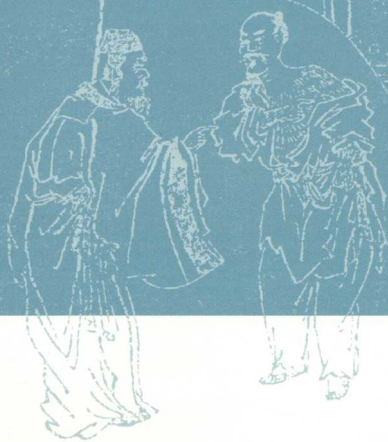
名誉主编 陈建功
主编 傅光明

插

图

本

评聊斋志异
说儒林外史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名誉主编
陈建功
主 编
傅光明

在文学馆
听讲座

插

图

本

评聊斋志异 说儒林外史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插图本评聊斋志异说儒林外史 / 陈建功名誉主编,
傅光明主编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8. 6

(在文学馆听讲座)

ISBN 978-7-80713-655-2

I. 插… II. ①陈…②傅… III. ①聊斋志异—文学研究
②儒林外史—文学研究 IV. 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6580 号

责任编辑 徐峙立

装帧设计 宋晓明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**山东画报出版社**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82098470

市场部(0531)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
规 格 148 × 210 毫米

9.5 印张 24 幅图 25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6000

定 价 21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另眼看“鬼狐”、“士林”

(代序)

傅光明

一

蒲松龄一辈子只干了两件大事，一是不间断地参加科举考试，二是孜孜不倦地写作《聊斋志异》，前者当然是刻意用心而为，却一世与功名无缘，后者或是闲暇无奈之举，然身后成就文名。显然，两者之间有着辩证的因果联系，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，是前者滋生出后者。简单一句话，县考、府考、院考三考均拔头筹的蒲松龄，却因乡试屡败不第，“意有所郁结”，遂“用传奇法而以志怪”，借“多具人情”的鬼狐花妖以抒“孤愤”。怎么不是呢？以《聊斋志异》的文学天赋，居然敷衍不出区区三篇达到乡试及格线的八股文，别说蒲松龄，搁谁都会超不爽。因此，从小说中读出对科举制度的含沙射影，指桑骂槐，实属入情入理。

蒲松龄是矛盾的，一方面，因科考不中而“孤愤”，另一方面，却又在“孤愤”之中仍情系科考，仕途之心，始终萦怀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想想常觉难以理解，早在17世纪，作为小说家，比莫



泊桑整整大 210 岁的蒲松龄，就已经那么娴熟地讲究文思和技巧。为表现、讽喻现实，他把笔下虚幻的鬼狐精魅游刃有余地驱遣得为艺术所用，呈现出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科考中举者都无法比拟的天赋写作才华。但作为一个“高考”落榜生，他的仕途如此不幸，年过古稀才混上个老“岁贡”，此后四年即驾鹤仙逝。不过，对中国小说的艺术贡献及后世读者，又实在幸莫大焉！试想，如果蒲松龄顺利中举，仕途坦荡，哪里还会有那么多的心灵苦楚、郁闷？有“孤愤”，也是矫情得无病呻吟；哪里还会躲在“聊斋”里，“志异”出那么多文言小说的天才之作？有，或许还真会像纪晓岚微词的那种“才子之笔，非著书者之笔也”。

吴敬梓可不像蒲公那么轴，非要在科举这一棵树上吊死，屡考屡败，屡败屡考，直至彻底没戏。吴敬梓倒非先知先觉，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跟“功名富贵”过不去，曾几何时，还以“家声科第从来美”自居，并一样地把求取功名作为人生唯一的价值取向。因此，到他后来描绘笔下像周进、范进那样只求“功名富贵”的人物不断落第的感受时，绝不是凭空想象，而是深切体察，刻骨铭心。就连他自己，也有过参加秀才科考因“酒后耳热”在文中发牢骚，几不被录取时，向考官“匍匐乞收”的境遇。至于他因何突然顿悟不惑，中年以后将科举丢到脑后，不再理睬，非一言以能蔽。但他终归科途醒悟，或许是遥念、心仪魏晋风骨，“佯狂忆步兵”？俗话说，性格即命运，吴敬梓有他笔下杜少卿的“麋鹿之性，草野惯了”。也正因为此，他才“性耽挥霍”，“浮云富贵非所爱，爱山成癖乐其真”，成了乡人眼里的“败家子”，耗尽家产，离开故里，移居秦淮，开始穷愁度日。又也许因为是自己亲手败家，轻弃膏腴，他才没有“世富贵而乍贫者”那样的“志卑而馁”，一蹶不振，相反，却活出了一身洒脱。闭上眼，科场的林林总总，士林的形形色色，便纷至沓来，如影随形般从笔底流淌而出，比俄国讽刺作家果戈里早一个世纪就在中国开了“讽刺之书”的先河。

无庸讳言，吴敬梓也是矛盾的，要不到了晚年，何以还以“乾

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”为荣呢？这一方面或可以见出，当年的确是因“消渴”病而错过了“博学鸿词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，胸中时有憾意；另一方面，同时可见其内心对科场还是有一份难解的心结，毕竟是“落魄诸生十二年”。不过，难得的是，吴老夫子已不像蒲公那样非跟自己较劲儿不可，而是安于自隐。有意思的是，两人的不同在于对科举的命运选择，一个是终生至死不悔，一个是中途主动放弃；而同则在于两种命运选择又都真实地折射进了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。更意味深长的是，一个借“鬼狐”挑刺人情，另一个拿“士林”讥讽世相，留下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上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，和一部“机锋所向，尤在士林”的“以公心讽世之书”。恰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指出的：“明末志怪群书，大抵简略，又多荒怪，诞而不情，《聊斋志异》独于详尽之外，示以平常，使花妖狐魅，多具人情，和易可亲，忘为异类，而又偶见鹘突，知非复人。”到《儒林外史》“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”。

简言之，由于这二位先贤的家庭出身、生活环境、科考境遇都不一样，对科举的讽刺、揭露、批判的着眼点与切入点亦有所不同。蒲松龄通过屡考不第，清晰目睹了科举的弊端，对试官的不公及试场的黑暗都有亲身的体验、感受，他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揭露、批判科举。而吴敬梓揭露的则主要是科考对读书人心灵、心态和心智的戕害。

二

考不上科举，也得养家糊口为稻粱谋，蒲松龄只好去当教书匠，一干就是三十年。幸运的是，毕府三十年，成为科场失意、困顿潦倒的蒲松龄最好的人生避难所。在这里，他靠教毕府子女背四书、诵五经、写八股、作诗文，衣食无忧；结识有一代文宗之誉的王士禛，其“爱听秋坟鬼唱歌”，即便自觉“十年颇得黄州意”，也备感“志异”觅得知音。同时，蒲松龄笔下的鬼世界时常温情胜



似人间无数，亦与官宦世家的毕府密切相关。毕府的丰富藏书、幽雅园林，都为他的鬼狐花妖故事起到了催生促产的作用。

《聊斋志异》是一部幻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小说，里面的许多小说，揭示出封建科举制度及其所带来的知识分子命运。它在离异奇幻的内容中时时处处透露出浓厚的人间气息，反映出人们关切的现实问题。仅举两个小例子，许多年前香港拍过一个根据《聊斋志异》中《促织》改编成的电影《蟋蟀皇帝》，今天现实生活中不是还有不少层层摊派、盘剥的“促织官员”吗？再拿狐女来看，在她们身上呈现出丰富、美丽、崇高的人性，是那么的石破天惊，而透过这些鬼狐花妖所表达的思想意义，更是令人称奇叫绝。

还常能发现，在蒲公刻意塑造的许许多多鬼狐花妖身上，闪烁着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单说一个王六郎，他是多么善良，没有因自己要还阳，而自私地把一位母亲捉去当替死鬼，撇下婴儿不管。这就是人本思想！甬提蒲公那个时代，环顾现实，莫说面对生死攸关，就算摆在眼前的“功名富贵”，得有多少人表现出来的是见利忘义啊！“花面逢迎，世人如鬼”，“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皆是也”。从这个角度可以说，真是连鬼都不如了。因此，蒲公龄决不是要将读者引入迷幻的天国，却是要引入真切的人世，并希望改变这人世，读来令人掩卷唏嘘、省思。

我想，一般读者，包括少时的我，一说《聊斋志异》便以为它是讲鬼故事的。看香港电影《画皮》时，我还很小，夜里做梦惊醒，觉得“聊斋”就是“鬼屋”，看都不敢看，更不会去想，鬼从民俗学的视角来审视，就是人类最早的原始鬼魂崇拜之一。现在知道了，《聊斋志异》里竟有那么多涉及民俗的篇章，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民俗世界。

《聊斋志异》被誉为中国民俗学的一部百科全书，在外国人眼里，它是了解古老而广阔的中华帝国民俗的入门。显而易见，这些民俗篇章在反映作者民俗思想的同时，也自然流露出他的民俗心理，像他浓郁强烈的男权意识，即是受时代所限。另外，民俗的编

织又丰富了作品的艺术想象，仕途不顺、孤愤不平的蒲松龄，借鬼狐花妖抒写自己的浪漫情怀，也使《聊斋志异》具有了一种诗性的特质，发散出一种诗意美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不是一般的志怪小说，而是屈原“天问式”的悲愤之作、孤愤之作。蒲公对鬼狐花妖“一书而兼二体”的艺术颠覆，前无古人，堪称独创。而当下诸多时髦的对名著似乎是无休止的“Q版”解构，却是货真价实的恶搞。庸俗的“戏说”、“恶搞”充斥媒体，若长此以往，受众也只能像王渔洋对《聊斋志异》的那句题辞“料应厌作人间语，爱听秋坟鬼唱时”所说，我改了两个字，叫“厌闻人间语，爱听鬼唱歌”。总之，读《聊斋》，可从鬼魅身上感悟人生！

自认“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，情类黄州，喜人谈鬼”的蒲松龄，深谙“文人之笔，无往不曲，直则少情，曲则有味”。因此，他能尽曲笔，写鬼狐，评时政，击流弊，颂人情，“处处为惊魂骇魄之文”，“笔笔作流风回云之势”，把“鬼狐”涂抹在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上，谁能说鬼文里无史迹呢？

“聊斋”篇末的“异史氏曰”，一准承自司马迁的“太史公曰”。若非蒲公有以“小说”来写“史”的意味，能如此乎？《史记》中“小说”笔法比比皆是，蒲公的“志异”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写史？！

三

在这个角度，《儒林外史》也是“小说”的历史，“外史”本身亦是借“稗官为史之支流”，且多用“微词”、“狙击”之史笔。

比起当下动辄下笔数十万言，三五年一部，甚至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多产作家，花十几年时间才含辛茹苦写完《儒林外史》的吴敬梓，像他的同道施耐庵、罗贯中、吴承恩、曹雪芹一样，一世一部却流芳。这已无需多说。

说到《儒林外史》，我想起以前看到过的一种似乎已成既定模式的评价，并非有什么错，只是觉得有意思。比如，有一条是这样写的：“《儒林外史》的批评矛头主要是针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，作品塑造了一群热衷科举、追求‘功名富贵’的读书人的形象，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、恶劣的社会风气，这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。”而我想说，《儒林外史》对当下依然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。应试教育体制下一代又一代在高考路上奋勇前行的现代“范进们”、许多读书人的利欲熏心、有些已渐成潜规则的学术腐败，等等，有多少不是该由新生代的吴敬梓们进行辛辣讽刺的！“功名富贵”之风席卷士林，许多人为求此而不择手段，惟利是图，甚至“礼义廉耻，一概都灭绝了”。

事实上，《红楼梦》与《儒林外史》这两部古典名著在当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后命运，即一个成为媒体炒作的文化噱头，一个却受到冷落，这种强烈反差同样值得思考，至少它是学风浮躁与随众心理的一个侧面反映。是文化出了问题，文化人出了问题，还是存在即合理，谁都没有问题？

因此，思考《儒林外史》的现代启示是有益的。其最重要的一点是，“利益驱动”体现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文人身上，功名富贵的核心就是当官。其实，即便拿现代考试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来说，在评定职称、申报学位点以及重点学科等“功名富贵”的事情上，也体现着与《儒林外史》相类似的“利益驱动”。不过，问题是，对“利益驱动”所带来的负面影响，难道必须得用中庸之道来平抑吗？再者，把当官当成人生唯一价值取向的“马二道路”，势必导致教育的功利化。

以现代视角看范进，他是喜剧的，还是悲剧的？他是科举制的牺牲品，还是幸运儿？同样是耐人寻味的。凡事都有两面性，看待事物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。特别是对古人，要给予“理解的同情”。拿科举来说，一方面，透过《儒林外史》，的确可以看到它的腐蚀

性,扭曲人性,制造废物,像中举前的周进、范进们无一例外;但另一方面,从科举制度的历史源流,又可看到,它的确是封建社会相对来说最为公平合理的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。

这样,吴敬梓的讽刺笔墨也变成了一把“双刃剑”。比如,读者耳熟能详莫过于范进中举后的大笑、发狂,但有多少读者是在领略人物描写的讽刺笔墨的同时,更感到它是人性之笔呢?换言之,吴敬梓对范进并非简单地讥笑、批判。想想看,在三十几年的时间里考了二十多回,经受了那么多灵与肉的双重磨折,突然中举之后,他的大笑、发狂不正是最自然的一种情感抒发与宣泄吗?

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是在给封建科举制唱颂歌。倘若如此,倒说明以前对科举制的否定过于简单了。

由《儒林外史》反观今天的教育制度,也会发现一些问题或缺陷。简单说两点,第一,我们缺乏尊老敬长的教育。当然,教育不能仅仅单纯来自学校,而应由家庭、学校与社会共同来承担,学生呆在家里的时间毕竟有限。最近,我女儿回到家,常称呼我为“老大”,我当然不会对她这样的称呼而暴怒,因为我知道她是在学校受了同学的影响,而这一影响又来自社会,来自目前的文化生态。电视、报纸、网络,“恶搞”盛行,“Q版”不断,多的是娱乐、炒作,缺少了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以电视为例,盲目追求收视率,而失去了文化担当,多可怕啊!

第二,我们缺乏对生命的敬畏。如果我们对生命能多一点同情、关爱与悲悯,对同类多一点理解、容忍与宽恕,社会便会多一分和谐。和谐社会的建立包括各个方面、环节的和谐,单拿教育来说也是如此。老舍先生有篇幽默散文,题目叫《考而不死是为神》。意思是考那么多的试,考完以后若还活着,就是神仙啦!但没有办法,考试是制度,不论封建科举制,还是现行的高考制度,虽然存在各自的问题,像高考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,但它们毕竟是相对公正的选拔人才的唯一合理的硬性标准。

应试科举的场景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:提着考篮,住在狭窄的



号子里，一考就是好几天。但我想，那些举子们，在忍受那样一份磨折的同时，心里一定会充满一种期待，那就是，他们把这视为通往仕途的唯一路径，一旦考中，就会像中举后的范进一样，成为科举的幸运儿！对许多人来说，高考也或多或少具有这样的意味。

这又让我想到了蒲公，他性格温厚，却又刚直，与时尚相左，对时势看不惯。我也时觉自己身上有点儿蒲公的“刚直”，对时下很多流行的东西看不顺眼。现在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，娱乐文化、消费文化、休闲文化，似乎成为了主流。各类媒体的文化版面、文化板块、文化栏目，几乎全让位给了那些灿烂“星汉”。明星成了文化的代名词。记得数年前北京电视台二套节目有个“每日文化播报”，可每日播报的净是些“星们”的“萍踪侠影”。我曾试着打过电话，说文学馆这儿有公益讲座，是否可以播报一下？人家回复说，那要产生些费用。就是要钱嘛！这时，我便涌上来一股蒲公的“刚直”劲儿，没钱，不报拉倒。现在好了，人家索性改成“每日文娱播报”，“文娱”要的是“文化”娱乐，而不是单纯的文化。这下没话说了吧！

以上点滴感思，均来自收入本书中在文学馆主讲《聊斋志异》和《儒林外史》的学者们，在此一并致谢。对我个人来说，幸运的是，在主持文学馆“公益性、学术性、高品位”演讲的近七年的时间里，得以结识一批又一批作家、学者，并能与其中许多的前辈、同辈成为忘年交和朋友，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学得知识。我不想夸大其词地说，主持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星期日公益演讲，业已成为我事业和生命的一部分，我愿在有生之年，努力为文学馆服务，为社会公众服务，为传播学术、文化尽职尽责。还是那句话，作为讲座主持人，竭诚欢迎各界朋友莅临文学馆，聆听智慧，感受讲座！

2007年10月2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

目 录

另眼看“鬼狐”、“士林”(代序) 傅光明 _____ 1

蒲松龄与《聊斋志异》 刘世德 _____ 3

《聊斋志异》的构思艺术与描写艺术 马振方 _____ 40

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民俗思想 于天池 _____ 61

《聊斋志异》的诗意美 周先慎 _____ 80

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人才问题小说 周先慎 _____ 110

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与版本 刘世德 _____ 141

几乎无事的悲剧

——谈谈《儒林外史》 张国风 _____ 177

范进：科举制的牺牲品还是幸运儿？ 侯 会 _____ 207

《儒林外史》的现代启示(上) 李汉秋 _____ 238

《儒林外史》的现代启示(下) 李汉秋 _____ 254

文学的独创性原则

——《聊斋志异》《儒林外史》的艺术和思想 段启明 _____ 270

在文学馆
听讲座

评聊斋志异

蒲松龄与《聊斋志异》

主持人：傅光明（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）

主讲人：刘世德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）

演讲时间：2007年1月7日



傅光明：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。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大学者刘世德先生。

刘先生早在几年前讲《水浒传》的作者与版本时就说过，中国古代小说多有个版本的问题。今天要讲的《聊斋志异》不仅不例外，而且版本较多，初步统计竟达60多种，有12卷本、16卷本、18卷本、24卷本等，主要有手稿本、铸雪斋抄本、青柯亭刻本和“三会本”等。在中国古代小说中，《聊斋志异》是唯一有手稿传世的，但可惜的是，只留下了半部。《聊斋志异》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版本？蒲松龄是如何写作，版本又是怎么流传的呢？请听刘世德先生演讲《蒲松龄与〈聊斋志异〉》。

刘世德：

朋友们，大家好！

今天演讲的题目是“蒲松龄和《聊斋志异》”。

《聊斋志异》是我国古代小说中非常伟大、非常优秀、非常杰出的小说，我对它还是比较喜欢的。

上个世纪四十年代，我读小学的时候，读到的第一部小说是《封神演义》，那时候很小，才上小学四年级，喜欢《封神演义》里那些神仙妖怪的描写。后来再读的一本就是《聊斋志异》。当时我在上海读小学，《聊斋志异》我看的不是全部的原文，我买到的《聊斋志异》一半是文言的原文，一半是白话的翻译，两边对照着的。那时我年纪小，文言文还不能完全读懂，只能是文白对照着读的，读得很有兴趣。

那时候我所在的学校的老师喜欢让学生到讲台上讲故事，你读过什么书，就讲什么故事。老师知道我读了些小说，我第一次讲，让我讲《封神演义》，我不会讲，才小学四年级，就拿着那本书站在前面去念。《封神演义》前面是没有故事情节的叙述，我也不懂，就照着念，才念了一页，底下的同学们就听烦了，说这么听没意思。老师就说：你干脆把书本拿开，凭你的记忆来讲吧。我第一次就讲了《封神演义》的故事。因为记不住，讲得也不是很流畅。

第二次再让我讲，我就讲了《聊斋志异》。《聊斋志异》比较好讲，因为它是短篇的，不像《封神演义》是一部长篇小说，整个故事很长。我大概讲了三四次，大家反应还可以。从此我就更喜欢看《聊斋志异》了。

我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工作以后，曾经想专门研究《聊斋志异》，也曾经想写一本书。《聊斋志异》有四百九十多篇，将近五百篇，我曾经幻想为每一篇写一篇文章，将近五百篇可以写成一本书，——那时年轻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就有不实际的幻想——但是没有实现，因为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后，不能自己——大家要知道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不能从自己的兴趣、愿望出发，定一个研

究项目，一切都由领导上安排的，领导布置什么项目，你就参加什么项目，那时我参加的还都是集体项目，没有个人项目，所以倒是研究了《红楼梦》，没有研究《聊斋志异》。可是我一直还是很喜欢《聊斋志异》。

大家知道，在世界上，国外有两位著名的大作家，都是写短篇小说出名的，一个是俄罗斯的契诃夫，一个是法国的莫泊桑，都是最伟大的短篇小说的作家。我认为，再加上我们中国的蒲松龄，在世界文学的范围里边来说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就是这三位。

所以《聊斋志异》不完全是属于我们中国的，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它的地位，而且更了不起的是它创作的数量，尽管在一部《聊斋志异》五百篇左右的篇幅中有一部分不能够叫做小说，但大部分是小说。数量上超过契诃夫，也比莫泊桑多，从内容的质量来说，一点儿也不比他们两位逊色。这一点，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，所以《聊斋志异》系列讲座，我很高兴也很愿意来讲第一讲。

我准备讲这么几个问题：

- 一、《聊斋志异》是“短篇小说集”么；
- 二、《聊斋志异》是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峰；
- 三、《聊斋志异》与周恩来总理；
- 四、三件传世的宝贵文物；
- 五、蒲松龄是哪个民族的作家？

六、蒲松龄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概括——读书、教书、著书、应试；

七、《聊斋志异》有哪些重要的版本；

八、《醒世姻缘传》是不是蒲松龄的作品。

这八个问题中，有的可以讲得比较详细，有的比较简略些，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学者来讲，为了避免重复，我就不多讲了。像第二个问题“《聊斋志异》是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峰”我就讲几句，因为估计后面还有其他的学者专门会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的。最后，如果有时间，我愿意再和大家交流一点看法，回答大家所提出

